

译者的解读与重构

——以小野西洲的《〈内地游记〉读后感》为例*

Understanding and Reconstruction by the Translator—
Ono Seishyu's "Readings into *Travels in the Mainland*"

杨承淑
YANG Chengshu

摘要:

《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主笔谢雪渔 1922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5 日, 受命于“台湾总督府”出席孔子祭典并游历日本归来后, 在该报汉文栏刊载了 75 篇《内地游记》。小野西洲将其首篇至第 12 篇游记重构并日译为 7 篇《〈内地游记〉读后感》, 披露于 1923 年 2 月 2—10 日的《台湾日日新报》上。

针对以上原作与译作, 我们可以审视两者对于日本“内地”¹ (Mainland Japan) 的描述内容及观察视角的异同, 并探究译者对于原文内容的取舍基准, 乃至译作增添的书写观点与内容上的偏移。此外, 本文通过分析作者与译者对于纪行文本中的官方人物与亲友故旧等人物描述或施以删节等手法, 以洞察他们对于作品中人物在社会角色的观察, 并探究其中的人际网络等相关线索。最后, 再从译者数年后的“内地”游记, 审视译者的创作与其译作之间的互文性, 以再次验证译者的操控与角色功能。

借此, 盼能从文本的翻译与解读及其再生产, 推至日台文人的社会角色与人际网络, 借以深掘特定译者或译者群体及其译事活动, 这在殖民社会中具有普遍意义。

关键词:

赞助人角色; 译者的操控; 译者主体性; 译作的再生产

Abstract:

Xie Xueyu, chief Chinese language columnist for the newspaper, after he was asked by the “Taiwan Soudokufu” (“Taiwan Governor General’s Office”) to attend the Confucius Memorial Ceremony in Japan from October 19 to November 15, 1922, wrote 75 *Travels in the Mainland* in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Ono Seishyu then read and translated the first twelve articles, compiling them into seven articles titled “Readings into *Travels in the Mainland*”, which were then published in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from February 2 to 10, 1923.

* 本研究为 2015—2016 年 (台湾) “科技部” 专题研究计划: “小野西洲的译者角色与人际网络: 以台湾日治时期为范畴” 执行成果之一。计划编号: MOST 104-2410-H-030-050。

Based on the aforementioned Chinese source texts and Japanese translations, the descriptions and observational perspectives of Mainland Japan by the two writers can be compared and contrasted, to establish a baseline standard for the translator's decisions on what parts of the original articles should be omitted, and what should be kept. Furthermore, the perspectives added by Ono in the translated texts, as well as the shifts in content in the translations, can also be analyzed. Additionally, this study explores how the author and translator described or omitted descriptions of characters such a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old friends and family, in order to delineate their observations towards the social roles of these characters, and the interpersonal networks implied herein. Final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translator Ono Seishyu's own chronicles of his travels to Mainland Japan in later years, in order to compare the intertextuality between his writings and his translations, to once again confirm the control exerted by a translator, and the role he plays.

The translation, understanding, and reproduction of the text can serve as a foundation to scrutinize the social roles and interpersonal networks of scholars in Taiwan and Japan. From this basi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certain translators or translator groups, and their translation works, can be obtained, which can be expanded to include colonized societies in general.

Key words:

patronage roles; translator control; translator subjectivity; translation reproduction

1. 前言

近代知识分子的跨国旅游书写，除了反映当事人“行万里路”的过程、所引发的知识冲击与思想变化等直接体验之外，对于通过报纸的读者而言，同样也受到了异国地景与人文风貌等浓烈鲜明的刺激，并渐次积累成为日后人生经验中的人文记忆。

然而，作者在书写旅游纪行之际，不免带着某种价值判断的视线，去观看异国他乡的人事与景物，且不自觉地与过往经验加以比较对照。其中包括了自身的人文素养、价值判断、美感经验、政治立场、民族意识等，乃至与过往旅游纪行之间的互文性等阅读经验或文化体认，都是值得详加检视的成分因素。

而另一方面，当前述旅游纪行受到被观览的该国人士翻译为其母语，且又再度披露于同一报纸，以供在台日籍人士或具日文阅读能力的台籍人士阅读时，势将触及“自我”与“他者”之间彼此解读，并涉及原文重构等环环相扣的议题。换言之，作者的人文素养、价值判断、美感经验、政治立场、民族意识等面向，皆足以促发译者对于母国经验的自我反思，译文也因而呈现了译者取舍之后的视线改变乃至结

构内容的重塑。

其实，此事的意涵不仅是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文化擦撞”而已。谢雪渔的《内地游记》是“总督府”对于台湾士绅与文人的官式邀访，其中的政治意涵与思想操作等，由殖民政府所进行的人为建构，难以不去想象。因而，衔命出访的作者与再现游记的译者之间，形成了殖民者对于被殖民者的认知与测度，也同时存在着彼此探究的反向观测。

本文拟从小野西洲的7篇《〈内地游记〉读后文》（「『内地遊記』を読む」），探索译文与原作对于“内地”的描述内容与观察视角，并审视译者对于原文内容的取舍基准，乃至译作增添的书写观点及其内容。此外，亦将对照小野自身的“内地”经验与文化脉络，探讨译者进行再生产之际，其个人经验与视角的投射内涵及其范围。本研究盼由译者的介入程度，测度其主体性与公共性等要素，及其在此一翻译与文化事件中的角色意义。

除此之外，通过对作者与译者的社会角色，拟进一步探究两者之间的公私关系及其交往轨迹，以及原作者的社会脉络与日籍官吏之间的人际网络及其间的主要节点等。借此，盼能借由文本的翻译与解读，推至日台文人的社会角色与人际网络，以精细描绘殖民治理脉络下的译者角色，及其译事活动之属性功能。

2. “内地”游历的撰述

1922—1923年间谢雪渔披露于《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近四个月的《内地游记》，多以每隔一天至两天的频率见报，共计刊载75篇。可以想见，当时这部作品乃至作者在报社与读者心中的地位与分量，不但十分厚重可观，且又格外与众不同。

日治时期台湾人士受“总督府”邀约，前往日本“内地”参访的前例，在谢雪渔之前仍不算多见。1896年2月24日至4月26日，台湾绅商李春生（1838—1924）等人随桦山资纪总督任满述职，兼以视察员身份赴日考察游历当属首开先例²。李氏游后随即披露了日记体见闻录，并连载于《台湾日日新报》（1898.05.06—1944.04.01）的前身——《台湾新报》（1896.06—1898.05.06）。日后则定名为《东游六十四日随笔》³，于福州美华书局印行，以“分送台人”⁴。

然而，李氏并非第一位受“总督府”招待的出行者。根据李春生书中3月2日的记载⁵，辜显荣在他访日之前，曾由首任民政长官水野遵（1850—1900）陪同前往东京，并下榻于同一洋式客寓⁶。辜氏访日之行虽早于李春生一行⁷，但以游记的长期连载及日后的数度出版观之，李氏的访日纪行，显然是更具持续影响力的。

其次，1897年8月3—31日，“台湾总督府”招待大嵯炭、林圯埔、埔里社及

蕃薯寮四抚垦署辖内 13 名原住民（泰雅族、布农族、邹族、泽利先族⁸）至日本进行 29 天的观光游览。根据谢欣纯（2011 年）的考察，李春生的旅游路线与行程设计，似乎成为来年原住民访日的模板。尤其在重要参访地点及民生建设方面，可说大致相同⁹。这也反映了“台湾总督府”对于邀访计划的操持逻辑，可说是秉持“展现帝国文明开化与先进建设”等既定原则与方针而规划执行的。

而大规模的招待旅游，则以 1903 年 3 月 1 日到 7 月 31 日在大阪举行的因学术人类馆的展示主题而备受争议的“第五回内国劝业博览会”最为盛大。当时，500 名以上台湾士绅组团前往大阪参观博览会之余，也顺访了大阪、京都、名古屋、东京等现代化城市。“台湾总督府”对于这次由各厅员导览的旅游成果归结为：“彼等概为乡党中具分量者，或从事产业或具笃志，能分享所感并扩展知见，日后对本岛民众之启发，影响所至，盖不少矣。”¹⁰可见，“总督府”对于选定的招待对象，是期望他们的社会位阶与文化影响力足以起带头示范作用的。

至于旅游路线方面，从以上三者的行程看来，旅游者大都从基隆港出发，经四天三夜抵日靠港之后，即以铁路为主要交通方式，并以途中之大城市为主要停留点，进而渐次由西往东（东京）移动。至于旅游地点及其牵涉之人事，在李谢两氏的旅途中，都还安排了一些私人行程。例如，谢氏于京都探视其子（三男师舜）、同行者许廷光家嗣南晚君等；而李氏之行更有安排同行孙辈前途的目的——如长房长孙李延龄的在日见习，长房次子李延禧的东京就学等。此外，行程内容也配合当事人的事业及兴趣，安排与相关人士晤谈或设宴款待等。若从提供旅资及人力物力等角度而言，此行完全可定调为官方的接待旅游，但同时也为当事人细心提供了量身定做的安排。如今，审视其官方的“义理人情”与受惠者的“投桃报李”之间，似不宜略过其中的人际脉络与人情世故等蛛丝马迹。

而另一方面，官方安排的行程除了配合当事人的访察身份及目的之外，李谢前往参访的共同处所还有：参观公私机构（皇居、学校）、名胜古迹（浅草寺）、大型公园¹¹（上野公园及其周边艺术典藏设施等）、唐人街（横滨），乃至观光饭店（帝国饭店）等上流时尚设施等。借此，可知从代表日本最高权威的皇居，乃至古今文化场域，或是待以上宾之处等，都是官方的重点展示项目。此外，与此相对的日本唐人街景象以及会晤亲友故旧等行程，也与官方安排不无关系，两者应非偶然相似所致。

诚如桦山总督于旅途第八日（参见 3 月 2 日记载）所言：“此次迟迟其行者，盖欲君等，同饱眼福，裨异日返台，悉将此时游历情境，转布岛民，未始不无稍补治台开化之一着也。”李氏闻言则自忖：“予至是，始晤公之处心积虑，无一不為大局计。”由此可见，“总督府”对于此行的用意，确曾通过“总督”之口，明白

表达其目的；而接受招待旅游者，自是心领神会。李春生如此，其他台湾士绅想必亦然。

最后，回到官方招待旅游的目的。从纪行文本中，可以探索旅游的过程，掌握其间发生的人事经纬，从而回溯推究其出访目的。而在书写内容以外，无论招待游人选的设置、文稿在第一大报的长期登载、日后的结集出版，乃至节译为日文等多层次的披露、多群体的诉求，以及日汉文先后登场的媒体操作手法等，都在显示其背后赞助人角色的功能不可轻忽。围绕文本内外，似乎仍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值得探究。

3. 《内地游记》的重构

谢雪渔自 1922 年 10 月 19 日至 11 月 15 日，受命于“台湾总督府”，远赴扶桑出席东京汤岛圣堂举行的孔子 2400 年追远纪念祭典。游历日本归来后，完成多达 75 篇的《内地游记》，陆续于 1922 年 11 月 25 日至 1923 年 3 月 15 日刊载于《台湾日日新报》汉文栏。其后，经由小野西洲的选读与翻译，将首篇至第 12 篇游记重构，并译为 7 篇《〈内地游记〉读后文》，于 1923 年 2 月 2—10 日，再度登上《台湾日日新报》。

有趣的是，小野西洲的日译文披露期间，谢氏原作仍在陆续登载。其中，令人好奇而又不解的是，小野所选的前 12 篇内容，竟然并未纳入 10 月 29 日谢氏一行于汤岛圣堂出席“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2400 年追远纪念祭”当天的记事，而仅选录到 10 月 28 日为止！何以译者竟将作者出游的主要任务略去不译？其实，小野译文刊出之前的 1923 年 1 月，谢氏游记已陆续登载至祭孔大典及东京之重要参访地点，如宫内省、新宿御苑、明治神宫、横滨市等。译者剪裁取舍的基准究竟何在？

为详查其究竟，本节首先就小野在译文里自行添加的书写内容，通过列表方式探察其中曲折究竟（详见表 1），并借此脉络深入挖掘译者介入作品的内容与意向。

表 1 「「内地遊記」を読む」之添加内容

| 原篇目 | 译文增添内容 / 刊载日期 | 篇幅说明 |
|-----|-------------------------|-----------------|
| 标题 | （一）基隆から門司まで（1923/02/02） | |
| 首段 | 译文写作背景 | 约占 1/4 篇幅 |
| 中段 | 介绍台人同辈间称呼方式 | 约占 1/8 篇幅 |
| 标题 | （二）内海の風光（1923/02/03） | 除标题外，未增添内容 |
| 末段 | 引唐张继诗《枫桥夜泊》与濑户内海情景相比拟 | 约 14 行，占 1/5 篇幅 |

续表

| 原篇目 | 译文增添内容 / 刊载日期 | 篇幅说明 |
|---------|--|----------------|
| 标题 | (三) 神戸の華僑 (1923/02/06) | |
| 次段 | 藉高青邱之咏, <u>对比上岸之情景</u> | 约占 1/6 篇幅 |
| 末段 | 1. 以支那町之不洁, 与台湾之 <u>卫生</u> 对比; 2. 呼应谢氏对石秋君之感怀, 亦表同感 | 约占 1/7 篇幅 |
| 标题 | (四) 京都の一日 (1923/02/07) | |
| 中段 | 日人常讥台人 <u>迷信</u> , <u>对比于此</u> , “内地”亦然 | 约占 5 行 |
| 末段 | 加入评语, 谓游记中有画、有景、有情、有声 | 约占 7 行 |
| 标题 | (五) 古風と洋式 (1923/02/08) | |
| 次段 | <u>对比丸井课长</u> 与许廷光各执东西之风 | 约 4.5 行 |
| 倒数第 3 段 | 1. <u>今古之比</u> ; 2. 颜云年台日宅邸之比 | 占 4+6 行, 约 1/7 |
| 末段 | 颜云年近传病笃, <u>中西医</u> 合力医治, 子息归台 | 占 13 行, 约 1/6 |
| 标题 | (六) 上野に遊ぶ (1923/02/09) | |
| 首段 | 直指游记对本岛人之 <u>宣传效益</u> | 约占 1/5 篇幅 |
| 标题 | (七) 台湾の名誉 (1923/02/10) | |
| 首段 | 叹台北无 <u>圣庙</u> 可祭孔, 多借学校充之 | 占 6 行 |
| 中段 | 吁请为兴建文庙踊跃捐资 | 占 6 行 |
| 末段 | 评谢氏此行之贡献及 <u>为台争光</u> 之事迹 | 占 16 行, 约 1/7 |

从表 1 中栏的各下划线处可知, 小野的译文添加, 多与日台间的对照比较有关。例如, 同辈称谓、景物情状、街市卫生、迷信风习、今古之比、东西风尚、日台宅邸、中西医药、孔庙有无等。其中, 某些对比或可解释为, 译者对于不谙台湾情况之(在台)日本读者, 提供加深对本文乃至对台认识的背景知识。例如, 写作背景、平辈间称呼、迷信与风习、中西之医药, 乃至台北无孔庙等, 皆可视为译者对于作品及其相关知识所扮演的诠释性角色功能。

然而, 译者在行文中也增添了不少个人私交或是情感见解等成分。在人物方面, 如「神戸の华侨」中寓居神戸的“石秋君”, 小野自陈乃神交十年的台南诗人谢维岩(号石秋, 1879—1921), 且呼应谢雪渔对于石秋君诗作的感怀; 又如「古风

と洋式」里提及为实业家颜云年（1987—1923）¹² 治病的四名中西群医，其中一位汉医——稻江（大稻埕）的叶练金（生卒年不详），其实正是曾治愈小野西洲鼠疫的救命恩人¹³！

而在披露个人情感与见解方面，前文提到的颜云年，因伤寒不治于 1923 年 2 月 9 日过世。而小野文章见报日期，正是 2 月 8 日¹⁴。可见，小野当时悬念颜氏病危的沉重殷切之情，对照于本文，可说是溢于言表。

此外，译者在译文的增添里，更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与评论。例如，「京都の一日」中，小野西洲对于谢雪渔的游记之作，自行增添了一段评语。他指出：“谢氏细览地图、地理、历史、市志等，经实地观览而下笔之游记，文中有画、有景、有情、有声，令人兴味盎然，每每跃然纸上。原作受本岛人何等赏读，恐非拙译得以企及也。”这段话里，包含了删除一整篇游记的结语（下划线处），佐以译者对于原作的客观评价，再加上对原作与译作的比较以及自叹不如的主观评语。由此可知，译者对于介入文本的“再生产”行为，似乎虽不自觉但又顺理成章。

甚至，在下一篇「上野に遊ぶ」的首段，译者又以 1/5 的篇幅，指出该游记对于本岛人的宣传效益十倍于“内地”人。谢氏之椽笔，犹如鲜活之影像，跃然于读者眼前。不仅是绝佳之内地宣传，亦为前往“内地”旅行者得以耳目一新之作，必可获益良多。

而在最后一篇译文——「台湾の名誉」末段，小野甚至加入了一段长达 16 行的“总结”，表达他对谢氏等人此行的评价。他的评语是：“帝都名士对于台湾之轻视，令人深感遗憾。然经丸井课长¹⁵ 尽力斡旋，始得与朝鲜同推祝文朗读代表，并为台湾赢得赞誉，除深感欣喜外，能令世人知悉台湾亦有文豪与书家，至感愉悦！谢汝铨君乃台湾文豪典范，许廷光君则为台湾书法家代表，得于帝国朝野群英荟萃之祭孔大典，为文并挥毫作成祭文，先师在天圣灵，必欣然察纳其虔诚，帝都名士必另眼看待其文采。”

这段话说明了小野对于日本本土人士如何看待台湾文士，是极为在意的。同时，他的评价立场也明显站在台湾这边。若同时对比「京都の一日」，他对自己译文的评语，甚至可说抬举谢文到不惜贬抑自己文章的地步。由此可知，他对台湾文士的文章，可说推崇备至。

甚至，就连谈到神户中华街“支那町”的不洁，也自行延伸了一段：“见支那町之不洁，可知台湾卫生犹胜“内地”；见中华会馆之宏伟，足以知支那民族如何之强大。”看来，小野西洲不仅力挺台湾，对于中华民族的团结捐资，兴建中华会馆之举，更是不惜笔墨，立意张扬。或许，也是借此呼吁有志之士，当为台北孔庙

的兴建踊跃捐献。若真如此，伏笔从第 2 篇埋下，直到第 7 篇才与之呼应，可说用心至深。且从前后文气与文意看来，似乎未见牵强之处，言之亦可成理。由此看来，小野下笔之前，多半心中早有布局，7 篇译文应非逐日成篇之作。

而另一方面，究竟谢文原作又有哪些内容遭到译者删除？整体而言，将 12 篇游记裁剪为 7 篇，自然是减多于增。现整理其增删如表 2，以收一目了然之功。

表 2 「「内地遊記」を読む」之增删内容对比

| 原篇目 | 译文增删内容 / 刊载日期 | 篇幅说明：增删分量 |
|------|--|-----------------|
| 标题 | (一) 基隆から門司まで (1923/02/02) | 对应原作第 1 ~ 3 篇 |
| 首段 1 | 增译文 <u>写作背景</u> ，删除原作者写作背景及临行细节 | 删 31 行，占 1/2 篇幅 |
| 中段 1 | 增台人同辈间称呼方式，删临行前细节 | 约 10 行 (1/6) |
| 2 | 删除 10 月 20—21 日，同船者及海上描述 | 删除 5/6 篇幅 |
| 首段 3 | 删门司入港前之叙述 | 删 4 行 |
| 中段 3 | 删门司港 <u>地理及贸易港特征</u> ， <u>人口、气候</u> 亦删；留文史印象 | 删 17 行 (1/2)，未增 |
| 标题 | (二) 内海の風光 (1923/02/03) | 对应原作第 4 篇 |
| 中段 4 | 删 <u>濑户内海之地势、潮流、水深、面积、海峡等细节</u> | 删 24 行 (1/2 弱) |
| 末段 4 | 删 22 日， <u>登神户港前之叙述</u> | 删 3 行 |
| 末段 4 | 增引唐张继诗《枫桥夜泊》与濑户内海情景相比拟 | 约 14 行 (1/5) |
| 标题 | (三) 神戸の華僑 (1923/02/06) | 对应原作第 5 篇 |
| 首段 5 | 删神户港 <u>地理、地势、人口、开港、气候</u> ，及入港前细节 | 删 8 行 |
| 中段 5 | 删 <u>庄玉波邀同船者往访元町之经过</u> | 删 22 行，少于 50% |
| 末段 5 | 增：1. 以支那町之不洁，与台湾之 <u>卫生对比</u> ； 2. 呼应谢氏对石秋君之感怀，亦表同感 | 增约 1/7 篇 |
| 标题 | (四) 京都の一日 (1923/02/07) | 对应原作第 6 ~ 8 篇 |
| 首段 6 | 删 24 日， <u>抵京都前之叙述</u> | 删 15 行，约 1/4 篇 |
| 末段 6 | 删 24 日下午 2 时后之作者私人之京都探胜 | 删 4 行 |
| 7 | 删京都之 <u>地理、历史、名胜古迹等详细描述</u> ；仅留音羽泷 | 删 48 行 (6/7) |

续表

| 原篇目 | 译文增删内容 / 刊载日期 | 篇幅说明：增删分量 |
|---------|---|--------------------|
| 中段 7 | 增日人常讥台人 <u>迷信</u> ， <u>对比于此</u> ，“内地”亦然 | 约增 5 行 |
| 首段 8 | 删 24 日午后京都探胜（含本愿寺介绍）；保留信徒之诚 | 删 14 行（1/4），保留 4 行 |
| 中段 8 | 删寺庭鸽群描述及有碍卫生之评；仅述寺外有佛具店 | 删 11 行，保留 1 行 |
| 末段 8 | 删是夜乘车往东京之记载；保留西京之风雅及特色 | 删 3 行，保留 8 行 |
| 末段 | 加入评语，谓游记中有画、有景、有情、有声 | 约增 7 行 |
| 标题 | （五）古風と洋式（1923/02/08） | 对应原作第 9 篇 |
| 首段 9 | 删颜云年京邸任事之李仙子姓名及与廖宗支过往交谊 | 删 3 行 |
| 次段 | 增对比丸井课长与许廷光各执东西之风 | 增 4.5 行 |
| 次 2 段 9 | 删丸井课长住处地点及嘱丸井电告总督与南北知事 | 删 6 行 |
| 倒数第 3 段 | 增 1. <u>今古之比</u> ；2. 颜云年台日宅邸之比 | 占 4+6 行（1/7） |
| 末段 | 增颜云年近传病笃， <u>中西医合力医治</u> ，子息归台 | 增 13 行（1/6） |
| 标题 | （六）上野に遊ぶ（1923/02/09） | 对应原作第 10 ~ 11 篇 |
| 首段 | 增游记对本岛人之宣传效益 | 增约 1/5 篇幅 |
| 10 | 删 26 日对东京 <u>地理、地景、市志等详述</u> ；仅留日期与查阅事 | 全篇删除，仅留首尾各 1 行 |
| 11 | 删帝室博物馆之 1~4 号馆等附属建物 | 删 2 行 |
| 11 | 删帝室博物馆之馆藏图书不及观览 | 删 2.5 行 |
| 11 | 删动物园饲养区分五区，但皆寻常所见 | 删 1.5 行 |
| 11 | 删动物园以巨象为首，原有二雄伟白熊，但皆已故 | 删 1.5 行 |
| 11 | 删闲闲园曾一度荒废，开园时乃加修缮 | 删 1 行 |
| 11 | 删“动物园之北，有东京美术学校”“园中树下休憩片时” | 删 1/0.5 行 |
| 11 | 删作者纠正第 10 回刊载内容之误植字词 | 删 4.5 行 |
| 标题 | （七）台湾の名誉（1923/02/10） | 对应原作第 12 篇 |
| 首段 12 | 增叹台北无 <u>圣庙</u> 可祭孔，多借学校充之；删“28 日正午” | 增 6 行，删 6 字 |

续表

| 原篇目 | 译文增删内容 / 刊载日期 | 篇幅说明: 增删分量 |
|-------|-------------------|---------------|
| 中段 12 | 增吁请为兴建文庙踊跃捐资 | 占 6 行 |
| 末段 12 | 增评谢氏此行之贡献及为台争光之事迹 | 占 16 行, 约 1/7 |

就原作与译文的体例而言, 原作以日记体叙事, 大都逐日且多依时序记载, 而译文则有多处删除日期或抹去时间记录, 甚至对于搭乘舟车的起讫等情景, 或是出于谢氏个人兴趣的游览行程等, 也都有刻意略去的迹象。换言之, 译者希望呈现于读者面前的, 并非谢雪渔的“内地”“游踪”; 而是通过谢雪渔的观察, 让日本读者理解台湾才子眼中的日本形象, 乃至谢氏带给台湾知识阶层的日本形象, 这样似乎才能解释译者的增删目的。此一理由, 似乎也较能合理解释何以小野未将谢氏的各地游历经纬一一纳入译文。

或许也因如此, 对于沿途各大城市的历史、地理、地景、气候、市志、地方特征等, 译者也都悉予删除, 想来应是考虑日本读者无须阅读此类常识性背景知识之故。此举也明确地反映出, 小野自然无须宣传“内地”, 且对于读者圈的设定与认识早有定见, 与原文作者是截然不同的。同时, 也说明了《台湾日日新报》的汉文与日文版读者群体, 其核心属性是台日分明的。

4. 小野西洲与谢雪渔的交集

小野西洲 (1884—1965) 是台湾日治时期法院通译小野真盛的笔名与雅号 (“草庵” “西洲生” 亦为其笔名)。他可谓是日治时期译事活动最为活跃 (任法院通译 29 年及华南银行文书 11 年共 40 年)、知识生产最为丰富 (达 1506 笔¹⁶)、官阶最高的一位法院通译。

他于 1901 年 16 岁来台任职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局雇员, 两年后正式担任法院通译, 其间除服役三年之外, 从事日汉语通译长达 42 年。1934 年开始担任高等法院通译, 并叙阶为高等官 (七等六级), 同时兼任“台湾总督府”评议会通译。直到日治结束时的 1945 年 6 月底, 他达到法院通译前所未有的最高位阶——四等四级 (三级俸)。

小野西洲原本不谙汉语, 亦未受正式学校教育, 来台后始终热爱汉语, 且长期跟随名师勤习汉诗文, 因而奠定了扎实的语文根底。同时, 因其衷心景仰成为法院通译, 最终晋升为全台最高官阶的法院通译。先后任职于台北地方法院通译共达 29 年 (1903—1919, 1932—1945), 1920—1931 年在华南银行担任文书与通译则达 11 年。